

兵灾之外还有天灾。1917 年的大水灾波及中国十几个省，其中北京和直隶地区受灾最为严重，以致灾民们“田禾淹没，颗粒无收”。直隶督军曹锟、红十字会天津分会都致电上海，要求中国红十字会总会展开救助。副会长沈敦和亲自北上主持救灾，红会一面在各大报纸刊登广告，募集捐款；一面准备治疗痢疾、疟疾等疾病的药物运往灾区。红会还用以工代赈的方法实施救灾，召集北京附近 12 个县的难民 2 万余人修路，一个人每月可以得到五元工钱，另外还给棉衣一套。对于这项花销，美国红十字会给予了资金援助。

1918 年 2 月，广东潮州等地发生地震，有十分之六七的房屋坍塌。潮梅镇守使刘志陆向红十字会上海总会求助，沈敦和闻讯后即拨款 2000 元，然后一面让汕头分会在当地募集善款，一面以总会名义登报募捐。也是在这一年，浙江的宁波、绍兴一带发生瘟疫，有的地方甚至“十室九空”。红会命医疗队携带“济生丹”3000 瓶到灾区，治愈了数千名患者。

对于外国的灾难，中国红十字会也都及时地伸出了援手，如 1906 年美国旧金山发生地震，上海红十字会捐助白银 2 万两；1919 年“十月革命”后，俄国出现大量难民，中国红十字会捐助旧军衣 1500 套和白银 7700 两。1923 年，日本关东大地震后，中国红十字会即派出救护队赶赴灾区。事后日本政府遣外交使团来华答谢，称“此次贵国人民，对于敝国震灾所给予伟大之同情，与贵会派遣医队之协助，特足使敝国上下一致感动”。

中国红十字会当年信誉卓著，筹款相对容易。周秋光在《红十字会在中国》一书中列举了红会经费的七个来源，即一些团体的常年捐、会费、中央及地方政府拨款、官绅捐款、华侨捐款、外国红十字会捐款和

所谓“宝塔捐”（由人挨户劝捐，无论捐款多少，都会登报鸣谢）。

因为可堪信任，所以大家才肯将钱交给红会去行善。段祺瑞、徐树铮、张镇芳这些政要的夫人都曾因慷慨解囊而登上《申报》，苏州的丁梅常年为红会捐款、捐物，在遗嘱中还捐出了 200 元、新棉衣 200 件、股票 100 股。又如 1913 年为筹办防疫医院，上海新舞台剧院发起义演募捐。各界人士踊跃购票，甚至有人一口气买了 100 张票。事后统计，有 110 多张票卖出后但无人前来看戏，买票只为捐款。

民国初年，地方军阀大都截留税收，且军费开支浩大，政府没有足够的力量实行救灾。这时候作为社会组织的红十字会担负起了救灾的责任，在政府力所不及的地方，发挥自己的特长，稳定了社会。

抗战中的牺牲

1927 年，国民政府在南京建立，中国政权又一次发生鼎革。当红十字会将自己选出的会长颜惠庆，副会长王正廷、虞洽卿的名单提交国府时，南京方面拒绝任命。1933 年立法院终于推出《中华民国红十字会管理条例》14 条，确立了政府与红会的关系：“总部以内政部为主管官署，并受外交部、军政部、海军部之监督，分会隶属于总会，以所在地地方行政官署为主管官署。”

在“九一八”事变已经爆发，中日全面开战只是时间问题的时候，政府将红十字会收编麾下，也是在为战争打算。在政府的干预下，外交部长王正廷成为新任会长，杜月笙和刘鸿生为副会长。1943 年，由国防最高委员会通过、立法院批准《红十字会战时



■ 1938 年夏，南京大屠杀第二年，南京鼓楼医院的部分工作人员合影。在红十字会的带动下，南京鼓楼医院进行了一系列抗争和救死扶伤活动

组织条例》，规定红会的正副会长，理事、监事等都由政府委派，而红会赴地方的救助队则要听从所属战区司令长官的命令。在政府中具有相当地位的戴季陶、翁文灏、宋子文等人都成为红会常务理事。

正如国府之前预计的那样，红十字会确实在抗战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但也为此付出了惨烈的牺牲。战争中，日军时常不顾红十字会的中立地位，对红会人员发起进攻。1937 年 8 月，设在上海东南医院的一个救护队被日机轰炸，医院里的图书室、大礼堂等都被炸毁，担架队长张松林被炸死。仅仅几天后，还是在上海，又有三名护士死于战火。1940 年 10 月，日机在浙江、湖南等地散布鼠疫杆菌，红会的医护队长刘宗猷在义乌一带从事防治时染病，最

后不治身亡。1945 年，红会护士梅碧芳在广东一个小镇上被日军包围，吞药自尽……战后编有《中国红十字会抗战期间遭受日军危害行为调查》，记录下了这些牺牲者的事迹。红会在四次长沙会战和南京大屠杀中的作为尤其令人尊敬。

红十字会在抗战中所做的贡献有目共睹，政府在会员招募、经费补助等问题上予以支持。同时国际红十字会对中国总会也愈加重视，在国际联合会第十八届理事会中，中国总会会长蒋梦麟被选为执行委员会副会长。

中共接手红十字会

截至 1948 年底，中华民国红十字会会有 193 个分会、38.5 万名会员。1949 年时的会长是蒋梦麟，他同国

民政府关系密切，东走台湾。留在大陆的中国红十字会人员以秘书长胡兰生为代表赴北京，请新政府接管。

刚刚获得政权的中国共产党没有管理慈善机构的经验，自然就向“老大哥”取经。卫生部部长李德全向中央介绍了苏联红十字会的历史、组织机构、工作内容等情况后说，其“现任主席由苏联中央卫生部副部长科立尼科夫兼任”。在随后的红会改组中，李德全被推选为新会长，胡兰生等为副会长。周恩来亲自修改了《中国红十字会章程》，规定红会是“中央人民政府领导下的人民卫生救护团体”，使其彻底失去了民间色彩。1952 年，国际红十字大会承认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红十字会为中国唯一的全国性红十字会。这是中共政权第一个获得合法席位的国际组织。

为了新旧政权划清界限，新的中国红十字会以李德全为“第一任会长”，以示从头开始。总会举办分会干部学习会，加强对中共和国家方针政策的学习，同时还组织红会人员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进行思想改造。

在中国国内政治运动不断的状况下，红十字会的活动也停滞了，直到“文革”结束才又恢复工作。截至 2011 年，中国红十字会设有 31 个省（自治区、直辖市）红十字会、334 个地（市）级红十字会、2848 个县级红十字会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红十字会、铁路系统红十字会、香港特别行政区红十字会、澳门特别行政区红十字会；有 215.6 万名志愿者，11 万个团体会员，2658 万名会员。

摘自《国家人文历史》2013 年第 11 期

绝响：永远的邓丽君

姜捷



妈当“经纪人”，“吓”退了不少追求者，但也结交了许多圈内的好朋友，特别是《群星会》里的班底。当时已经算是很大牌的张琪、谢雷、吴静娴等歌星，对她的评价都不错，《群星会》这个节目里的歌星大多有自己的歌可唱，属于邓丽君的招牌歌就是别人怎么学也学不来的《一见你就笑》。这首歌很适合她的型，没多久就奠定了她的玉女地位，尤其是她特殊的转音式尾音，就有属于她的腔调与味道，辨识度非常强；另外，当时并不流行动感唱法，有一点儿舞蹈基础的她载歌载舞的演出，更为现场演唱加分，没多久，她就尝到了人红时间少、自由也少、隐私也少的相对付出。

邓丽君偶尔会忙里偷闲地去打保龄球，或陪着妈妈和家人看看电影（这是从小养成的老习惯了）。她喜欢男明星中的乔庄，也喜欢女明星中的李丽华、乐蒂。不过，她并不赞成女人结婚之后还要出来演戏，在她的少女心灵认为，歌唱或演戏是不能当永久职业的，她曾对邓妈妈说过一些不太像她的青春年龄所该有的感受——将来会因为声音坏了或结婚了而告别歌坛，谁也没有料到，日后她会以生命的终结来告别歌坛，让人们对她怀念深深、感慨万千……

晚上的演唱活动接得多，相对的，做功课的时间就很少。每天晚上回家都已经累坏了，第二天又要早起，长期下来，谁都受不了，何况是一个十几岁的孩子？读书的时间太少导致邓丽君的课业并不理想，白天没什么精神上课，就算再聪明功课也不会好到哪里去。在一个以学业成绩品评学生好坏的上世纪 60 年代，邓丽君不是问题学生，却是个让师长很有意见的学生。即使她的导师很看好她、心疼她，却无法兼顾演唱和求学，为她的前途颇为忧心。

学校的师长对她的“走唱”并不谅解，甚至对家长也颇多微词。他们认为小小年纪放弃学业而去唱歌，让小孩子来为家里赚钱，是一种崇尚虚荣的想法。家长不以孩子成长期间的纯真、上进、用功读书为要务，反而鼓励她抛头露面，走入声色场所，更是莫名其妙！他们认为该让她做出一个决定，不能再两头奔忙，这不是学生该有的生活。

5.我有两件事托付给你们

火箭消失了，那条船却毫无反应。“这样近的距离，按说应该看到？”罗全布说。“看是应该看到，”轮机长分析，“不过当班的驾驶员可能没对外瞭望，没发现。”“也可能看到了，”欣荣忿忿然，“可就是见死不救，这帮家伙！”“这儿海区常有索马里海盗活动，情况复杂。”罗全布分析，“有些船生怕中计，吃不准，不敢贸然靠近。”说话间那船渐渐远去。“嗨！”——水波猛然举起双手向着轮船大声呼唤，“求求你们，别走，别走呵！”“救生火箭都不顶事，你喊有啥用？”罗全布说。“小姐，还是省点体力吧。”欣荣劝她。“呜！呜！——”像个失去爹娘的孩子，水波双手掩面，哀哭起来。她哭得那么伤心，那么动情，弄得三个男人心里也酸酸的。

欣荣用微微发颤的手握住记号笔，在舱壁上又加一条杠。他数一遍：10 条——整整 10 天了。

最后一支救生火箭发射后未能得到救援，对每个人都是沉重的打击。大家嘴里不说，可心里都清楚：生还的希望更渺茫了。

印度洋上酷热难当，赖以生存的淡水和压缩饼干所剩已经不多。原来每人每天喝一小杯水、吃三块饼干，现在减半：每人每天喝半杯水，吃一块饼干。就这样这点水和食物最多也只能再维持七八天。

罗全布年老体弱，有心脏病，加上内心的煎熬和愧疚，瘦得皮包骨头，头发胡须全都白了。三天前开始发烧，嘴唇干裂，满是血泡，看上去十分可怕。“阿欣！”罗全布颤抖着轻声喊。“船长！”水手长以为他要喝水，提起装水的大塑料瓶，拧开瓶盖，小心翼翼地倒满，送到他嘴边。“谢谢，我不喝。”罗全布声音哑哑。“看来我——我到——到终点站了。我有两——两件事，托——托付给你们。”“船长，你说吧，”欣荣紧握住罗全布的手。“老朱，阿欣，我——我有个笔记本留——留给你们。”罗全布侧身，“你们把——我腰间的布带解下来。”

欣荣解下罗全布腰间的布带，布带上有个小口袋，里面装着一个塑料封面的小笔记本。“这——这上面详细记着我与幸运卫星

电——电话通话的日期、内容。”罗全布喘息、呜咽，“我恨自己——我对不起你们，对——对不起全船遇难的弟兄。他望着朱海根：“海根，你保——保存好，带回去公之于众。”“嗯。”朱海根点头，将布带束在腰上。罗全布紧闭着双眼静静地躺着，一动不动。三个人围着他跪成一圈。也不知过了多久，一小时、两小时——三个跪着、疲惫虚弱的人再也无法支撑。轮机长朱海根轻声：送他上路吧。欣荣抹去泪痕点点头。“咱们磕三个头。”朱海根带头磕起来。磕完头，欣荣抬头，朱海根抱脚，水波托腰，将老船长僵硬的遗体抬起来，送进了印度洋。

第 20 天，酷热。太阳像个大火球，高悬天际。昔日汹涌的印度洋此刻波平如镜，救生筏纹丝不动。

欣荣、水波像两条烘干的鱼躺在筏底，喘着粗气。3 天前，瘦小的轮机长朱海根因体力极度衰竭，也闭上了眼睛。临终前他艰难地留一句话：“阿欣，如果回去，给我家里打个电话。”解下老船长装笔记本的布腰带，“这个就交给你了。”

欣荣很难过，想哭也没眼泪。“热、热、热。”水波痛苦地呻吟着。“忍忍吧，”欣荣轻声。“我不懂，为啥这么

热？而且没一点风。”水波问。“我估计我们飘到了赤道无风带。”欣荣判断，“无风带没有风，酷热。”“看样子这儿是咱俩的终点站。”“别这么想。”欣荣想起什么，捡起角落里一个塑料水瓶。“这里面还能有水？”水波疑惑。“没有。”欣荣将所有空瓶检查一遍，哪怕泪珠似的水滴也不放过，最后居然搜集到半瓶盖大约 30 毫升的水。他将它递给水波：“你喝吧。”

水波用颤巍巍的双手接过瓶盖，望着里面晶莹的水。有生以来不知喝过多少水，但没有什么水如此稀罕，如此珍贵。她先用舌尖舔舔水，然后抿一小口，最后，又递给了欣荣……此时，饥饿又来袭。水波记得 6 天前吃下最后一块压缩饼干，此后就没再吃任何东西。胃痉挛、眼睛发花、身上冒虚汗，连抬手的力气都没有。她觉得自己就要不行了。“阿欣，我饿。”欣荣仰躺着，有气无力：“我也一样，饿得难受。”“有什么好吃的吗？”“让我想想，”欣荣沉吟，“哦，我们可以钓鱼。”

张士敏

印度洋的承诺

